

第十四章 实权者邓小平最后的挑战

从新闻记者转当学院院长

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一角之行，是我作为新闻记者的最后一次采访。1990年5月1日，我转任当了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是朝日新闻社系统的企业下面的一个所属单位。

当时日本受“天安门事件”的影响还很深，学汉语的人急速减少。我赴任的学院也不例外，最多的时候曾达到近三百五十名学生，结果减少到两百四十名，学院面临经营不下去的危机。

在学生激减的情况下

在我心中有一种默默期待的东西。到学院赴任前在最后那次采访中所感觉到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那种确实的“对共有的探求”就是支撑我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我想，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让那些优秀的工作人员和讲师齐心协力，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使学院继续下去吧。从我内心涌起一股执着热情。

就任后我给一些关系亲密的前辈、同事和朋友发出了这样一封“致敬信”。

“敬启

和煦芳芳，谨祝各位日益健康清祥。

小生在任新闻记者后第三十五个春天，于5月1日被派赴任朝日新闻关联企业之一的朝日中国文化学院。

小生历经浦和支局、山形支局、东京总社的社会部，于1962年夏天移调国外通讯部。从那以后二十七年来，先后任新加坡、北京、香港各支局局长和亚洲总局局长，一直从事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问题。

结束记者生涯，乃是百感交集。但新的工作与小生一直从事的事业有一种深不可解之缘的感觉。

似乎有不少人对东欧及苏联的民主改革越来越关心，同时又无法抹掉“天安门事件”给中国动向留下的后遗症。在此情况下，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命运将面临极其严峻的现实。

但小生坚信，日本和中国的友谊将会克服任何障碍，新颖的气息必会复苏。

本学院就位于那“汽笛一声到新桥”的、有着历史性意义的蒸气机车的新桥站前广场“新桥新大楼”的八层。

敬候各位随时光临指导，恭听各位高见。

1990年5月吉日”

努力备战的巷间“名门学校”

朝日中国文化学院是朝日新闻社全部投资的关联企业(株)朝日兴发下面的一个所属单位，成立于1981年4月。学院只有三间教室（现在有五间）和一间事务兼教员室，小巧整洁，在全国近两百七十所汉语民

间教育机构中，是前三名内的巷间“名门学校”。

此学院的特点是为满足学生的不同要求，分别开设了不同水平、不同时间的各种班。有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整天上学的两年本科班；有面向无固定工作、家庭主妇、及退休人员的下午班；有以上班族为对象的、上班前7点半到8点45的早上班；还有为下班后学习的人开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的夜间班。

除本科班以外，其它班级都是以实用汉语为主，时间为六个月，分初级、中级和高级。另外在本科班上面还设有有一年制的学业科目，在六个月的实用汉语班里设有丰富多样的应用、研究科目。其它还有难度较高的生活会话、日译中、时事问题及文学作品的阅读等课，内容丰富多彩。还有利用周末而开的周六讲座。

以上是普通话班，另外还有广东话班、打字机特别讲座、个人授课、翻译业务等等。广东话班还有独自の函授讲座，很受欢迎。

独特的讲师和学生

讲师由日中双方一些优秀的老师三十七人左右组成，七成以上是中国人。人才济济，他们都是在一些有名的大学或研究机关修定了历史、语言、文学、经济、医学的，日语也都呱呱叫。

学院的学生也很独特。本科班里有高中毕业后，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利用“朝日奖学金制度”一边送报纸一边艰苦学习的年青人。还有由于无法应付中国人的急病患者，而想掌握汉语的护士。有在夜校高中教授日本残留孤儿归日子女的老师，有被《三国志》着迷而来学汉语的女性，还有从大学哲学系退学而进入本学院的年青人。有在大学预备学校教社会课的老师，还有在退休前辞掉工作、在中国大陆骑骆驼横过沙漠、被中国雄伟辽阔的魅力所感动的人。

来早上班和夜间班学习的是一些活跃在综合商社、公司厂家、金融机关、旅行社、通信运输、新闻报道等各界第一线的人。来下午班学习的主要是一些上了年纪后想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在中国而开始学中文的那些人以及家庭主妇，有些人在学院完成学业后而从事翻译工作。学院开始时只有一百二十名左右的学生，后来学生人数慢慢增加。特别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日中青年进行大规模交流的1985年以及提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1988年所开的定期讲座，学生人数达到了三百三十一—三百五十名左右。

但中国在88年采取了抑制经济过热的政策，那年秋天的学生人数一下子就下降到了三百人以下。89年6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同年秋天开的定期课程的学生减少到了二百四十人。

“光明的未来必定会到来”

景气越来越不行，使得1990年春季的定期课程达到最糟的程度。多年来一直是春季的定期课程的学生比前一年秋天的学生要增加10%到15%。但这年4月中旬开始上课时的学生只有二百二十人。到4月底终于勉强增加到与前一年秋天同样的人员数：二百四十人。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学院赴任的。学院里还有人担心，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秋天的定期课程的学生很有可能会降到两百人以下。

因为我已被内定为新院长，所以在赴任前的4月中旬，让我在本科的开学典礼上致开幕词。在讲话中我谈到了自己刚结束的那次采访的亲身体会。中国在外表上看起来在世界上很孤立，但在社会体制各自不同的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社会里，正在开始了“共存的探索”。而且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社会也在不断加入进来。这种动向，会使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关系得以好转，我们学院的前途必定会有光明的到来。我大胆地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开学典礼上，学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本科、专科的老师们都出席了，大家都表情认真地听着我发言。从他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也有一种在苦境中逆境而上的决心。大家齐心协力，集智合谋一步一步地把学院坚持办下去。我为能看到他们这样的决心而感到无比欣慰。

中国重新打开与外界接触活动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难题，得有“天时”才行。为此，就必须确实掌握中国方面是怎样对应外界世界的，围绕着中国大陆的国际环境将会怎样推移等等。

到90年7月上旬，我慢慢地对学院的工作以及其它有影响的学院的动向有了一些了解。那时正好从中国先后寄来了两封“邀请信”。一封是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寄来的。邀请信说8月16日到20日将在首都北京召开“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邀请我参加。另外一封是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和日本孙文研究会寄来的。围绕着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孙文，1866年—1925年）的思想和业绩研究，在8月初将在孙文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召开题为“孙中山与亚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我一定参加。

北京的“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与我的工作有关，我一定要参加。“孙中山与亚洲”的学术讨论与我的工作没有直接关联，但我很想直接具体了解一下中国努力与亚洲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这样，中山市召开的会议我就利用暑假“自费”去，而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就以“公费”出差形式参加了。

“孙中山与亚洲”的会议有来自中国、台湾、日本、香港、澳门、韩国及印度等国家的一百七十五名学者和研究者参加。在整个会议中就孙文研究和中台学术交流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汉语教研座谈会”，除了亚洲以外，还有不少来自欧美的学者参加。会议期间还专门安排了李鹏总理招待外国与会者到中南海进行交谈。

在这儿没有篇幅去介绍那两个会议的内容。但让人能感到，天安门事件后在世界上日益陷入“孤立化”的中国，在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正在努力争取重新打开与外界的联系。

倍受欢迎的漫画书《庄子》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去逛了一下北京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我问一位女售货员，“现在在一般老百

姓中间最受欢迎的是什么书？”她马上就拿给我一本书看。那是一本根据庄子言行录而编画的漫画书，作者是一位叫蔡志忠（当时四十三岁）的台湾漫画家。

有道是“缘分不可思议”，这位蔡先生我曾在东京和台北好几次一块喝过酒，而且我还去拜访过他工作的地方。他头发垂肩，穿着朴素的布衣服，提着帆布提包，瘦瘦的中等个儿，是一位很洒脱的人。

1985年他画的《庄子》一书在台湾一上市就成了畅销书。不久此书在香港和新加坡也大受欢迎，后又传到了中国本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在漫画的解说栏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人们的判断经常是相对的，而绝对正确的东西是哪儿也不会存在的。尽管如此，人总是依靠‘知性’来绝对地看待自己的判断。这是有着知性动物人的宿命悲剧的根源所在。要消除这个悲剧的根源，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意识到‘知性’的有限而超越‘知性’。这就是所谓的‘不知之知’。”

时代的潮流毕竟是从“绝对”到“相对”，从“专制”到“民主”，在不断变化的，这正是大多数人衷心欢迎的。而这个时候问世的漫画书“庄子”无疑成了人们的先导和人心所向。

“天时”终于来了

这次的中国之行收获很大。在这儿不但看到了中国、香港、台湾，而且还看到了遍及亚洲全地区之间的交流。这可真是“天时”，对学院的继续生存无疑是一股复生之春风。

不久，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兆头。中国先后在90年8月与印度尼西亚、在10月与新加坡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韩国开始不断对华接近，而且两国还同意相互设立贸易事务所。中国与东南亚最大国之一、并与越南有着友好关系的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这时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柬埔寨问题带来了福音。

在这种情况下，天安门事件后一直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的西方先进各国也开始采取对中缓和的政策了。特别是日本，在90年秋天解冻了对中第三次日元贷款，第二年即91年1月大藏省大臣桥本访问了中国，同年5月又实现了海部总理大臣的访华。

时局的巨大变动，特别是日中关系的好转，在我们这小小的学院的学生人数上也有所反映。一直担心90年秋季的定期课程的学生人数会不到两百人，结果反而还比春季课程的学生多，达到两百五十六人。91年春季又增加到两百八十人，同年秋季竟超过了三百人。春秋两季学生人数连续增加，打破了历年来的常规。

这强有力的时局变动打开了光明的未来。使得“天安门事件”留下的深刻的后遗症得已烟消云散。

吹响“改革开放”进军号角

1991年这一年中国一边严肃地进行天安门事件后的善后处理和艰难的政策调整工作，一边同时又重新开始改革开放的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但在党内围绕着今后领导权，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

间一直在理论上存在着分歧。

保守改革两派之间的深刻的政策争议

“保守派”的立场是，在今后十年的时间里要保持经济增长率在 6%左右，在第八个五年计划（91年~95年）前期要坚持经济调整的方针。对此，“改革派”则主张，由于市场改革的推进，解决了 1989 年以来的需求不足和市场停滞的现象，所以应该可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但在 91 年 8 月下旬苏联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制止改革的政变。而且还是“短命政权”就告结束，其结果是苏联共产党宣告解体。

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保守派认为这是苏联“和平演变”的结局，从而产生了危机意识，因此极力提出加强反“和平演变”斗争是党内的主要任务。

但“改革派”则认为，苏联“保守派”政变的失败是他们背叛了广大群众坚决反对政治牵强的结果，并指出只有经济发展才是确保中国安定之出路，政治的“左倾”只能产生相反的结果。

在这个争议中最高实权者邓小平站在了后一立场上。邓氏在天安门事件后，批评要求民主化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对容忍此行为的赵紫阳总书记（当时）等“改革派”的政治态度进行责难，采取了强制的镇压手段。

但在 91 年，他一面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一面明确提出了要搞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为此，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改善等，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亚洲各国与欧美各国不同，不是采取批判政治体制的方法，而是走探求“和平共处”之路，努力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邓小平已注意到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好机会。

尽管如此，从 91 年秋天到年末，在中国最高领导层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政策争议非常激烈。香港的消息说，“保守派”成员由于有着深刻的危机感，他们联名给中央常务委员会及邓小平写了信，要求召开“中央特别工作会议”来讨论党和国家的出路，并概括深圳经济特区为资本主义。

“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第二年即 92 年初出现了结束这场争议的冲击性事件。即实权者邓小平吹响了“坚持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

这一年的 1 月 18 日到 2 月 21 日，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在各地发表了“重要谈话”。特别是在八年后重访深圳经济特区时的大胆的发言，通过香港也片断地传到了海外。

“我前一次来广东是 1984 年。当时农村改革开始还没几年，经济特区也刚开始。八年过去了，这次转着看了一下，深圳、珠海地区以及其它地区发展得都这么快，是没有意料到的。这次亲眼看见了，心里非常踏实。”

“一定要放大步子搞改革开放。象小脚女人那样是不行的。只要认为是正确的，就应该大胆试着干。

深圳的宝贵经验就是这种放手大干。没有冒险的勇气就不会开拓新的道路。”

“是计划太多了还是市场太多了，这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而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讲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就是最终让大家都富起来吗？”

“证券、股票这些东西到底是好是坏，是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可不可以用，这都应该大胆试一试。如果觉得可以，试行一两年后，没有问题就可以放开搞。如果觉得不行就改。有什么可怕的？”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之处就在于，社会主义要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化财富，进行参考，同时还要吸收和参考包括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在内的、现代社会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这大胆的谈话仿佛一挺机关枪嘟嘟嘟连发不断，这与文革中作为批判对象的“白猫黑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很相似。邓小平每到一处都跟当地的领导人会见，做多数派的工作，在珠海还召开了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争取军队的支持，这是采取了从地方向“保守派”据点的中央宣传部门进行冲击的战术。

经济建设才是“中心”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2月28日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要旨”在党内的上级部门进行了传达，同时还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的通知”（1992年第二号文件）。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决定，要落实邓小平重要谈话的主要精神。

在这前后，通过香港的报纸和杂志，邓的谈话要旨也开始流到外界，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谈话还重新强调了要坚持决定改变以政治思想优先的文革路线，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指出要坚持这样做的保证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个路线“百年坚持不变”，在这点上一定不能动摇。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的是，经济建设才是“中心”，为此，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一直极力强调“两个基本点”之一的“四项基本原则”，但在邓小平谈话内容里，其强调重点明确移到了“改革开放”，要加速改革开放步伐，集中优势搞好经济建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重点转移”的情况呢？从香港流传出来的各种信息中可以使以下情况得以清楚。

“二号文件”

据说“邓小平谈话”再新号召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主要理由是，天安门事件以后“保守派”成员提出了“两个中心”的路线，即思想教育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另外，随着理论对立的激化，广泛开展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在“经济建设”前面的运动。

这再次让人感到，中国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理论对立是多么地激烈尖锐。这使得我非

常希望能读一下收录了“邓小平谈话”全文的那个“二号文件”。

三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一位中国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手里有“二号文件”。那位朋友已在日本工作了，经常来往于日中之间，是位可信赖的朋友。这电话完全是偶然，但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二号文件”是横体字，封面上大字写着“中共中央文件”，其下面小字写着“中发（1992）二号”。数字是阿拉伯字母。左上角写有“机密”二字，其上面有一处被涂的痕迹，据说那是表示发行部数两万两千七百份的“号码”的地方。

“应该警惕的是‘左’倾”

我集中精力一口气看完了“二号文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地方是论述“应该警惕的是‘左’倾”。现简单引用如下。

“右倾会葬送社会主义，‘左倾’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警惕右倾，但‘左倾’也要防止。动乱就是右倾的结果。对此有人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其实这就是‘左倾’”。

邓小平谈话中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作为区别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基准，要看三点，即，对提高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利，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使得所有的人都富起来。”因此，应该大胆的吸收包括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在内的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以及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这样就把改革开放从一直强调的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思想斗争的对象中划分出去了。应该受到批判的只剩下政治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议会主义了。

邓小平的想法与大肆喧闹的“保守派”的想法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寓意深长的“南巡讲话”

被称为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二号文件”中的内容丰富多彩、寓意深长。

针对“保守派”对经济特区的批判，他不但高度赞扬了八年后重访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现状，而且挑战性地提出了上海也应该成为经济特区。

他认为“保守派”主张的安定增长是“等于后退”，应该把目光投向亚洲四条龙等亚洲邻国及地区的高度经济发展上，以此抓住绝好机会，促进高度发展。

另外，他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在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的五年内（1984年～1988年）得到了扩大和发展。正是有了那些成果才使得“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的三年中所进行的整顿和政策调整得以顺利进行。他说，“那五年的高度发展的功劳很大，这是我的评价。”

但他同时提到作为第三代领导人提拔起来的胡、赵两人都失败了，“他们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栽倒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

在这点上，他要求放手大搞经济建设，同时政治上不要放松对“右倾”和“左倾”的警惕，要做到准确无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二号文件”是在“天安门事件”到“苏联崩溃”这不平凡的时期里发表的，而且又作为中共中央的决议文件进行采纳，这一点很值得注目。

对中国来说，已目睹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会带来社会制度崩溃的结果。所以六·四以后的思想整顿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吧。但六·四以后的“左倾化”现象，特别是思想教育运动等，以“天安门事件”为借口，搞得太过分了，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减慢。从“二号文件”中可以充分看出对此现象的危机感。“应该警惕的是‘左倾’”，从这句一针见血的话中可以充分体会到其担忧之深。

“邓小平同志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抓住当前有利机会，加速改革开放步伐、集中优势搞好经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讲话。这个重要谈话将为成功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是“二号文件”中相当于前言的“通知”里的一段话，指出了谈话的重要性。

在92年10月召开的第十四届党代会上，决定把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目标。

“探求共存”的朝鲜半岛

以实权者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契机，中国又回到了改革开放路线上来，围绕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亚洲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开始缓和起来。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当年4月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了日本。

同年10月，日本天皇和皇后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了中国。

8月中旬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9月韩国总理卢泰愚访华。11月末李鹏总理访问越南，12月韩国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

进入93年后，错综复杂的中台关系也有所改善，4月下旬在新加坡举行了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理事长辜振甫）之间的“民间性最高会谈”。

由于“怀疑核武器”而进入危机局面

但是，94年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的危机。事情的发端是在92年1月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IAEF）的核武器视察协议上签了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于94年3月附加了限制对宁边放射化学研究所视察的条件。正好那时此研究所被怀疑为是核武器再处理之地，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中的“无法确认

没转用于军事方面，”引起了很大反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别理事会为探求事实真相要求北朝鲜能接受全部视察，同时期待联合国安理会能打开事态的局面。

与视察同时举行的朝鲜半岛南北特使交换的实务性协议也告决裂。报道说，会谈的最后，北朝鲜的代表留下一句耸听之言“一旦战争爆发，汉城即刻成为一片火海”后，离席而去。

以完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视察和实现南北特使交换为条件，一时曾宣告中止的 94 年的代名为“集体精神”的美韩共同军事演习又决定照旧进行，美国还决定向韩国配备爱国者导弹。美朝之间的高层次会议也就随之流产。

对此，北朝鲜的最高层指出“我们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搞核武器开发”，非难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歪曲视察结果，并暗示要退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NPT）。

参加汉城的国际会议

朝鲜半岛的局势急速恶化的 4 月初，从由韩国、北朝鲜、中国、蒙古、俄罗斯和日本等六国组成的“北东亚经济协作民间协会”的驻韩国总部寄来了一封邀请我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信。

从 5 月 25 日起北协会将在汉城举行为期三天的题为“北东亚经济圈的发展和太平洋共同体的提案”的座谈会。

邀请信上印有担任主持协会的韩国总代表、韩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之一，“现代集团”的会长郑世永的签名。后援是韩国有影响的报纸之一《东亚日报》，题目有三个，其中之一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北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协作与发展”。

对此邀请我非常感谢，讨论题目也是我感兴趣的。但本人不是从事朝鲜问题研究的，感谢归感谢，最后我还是决定不去参加。没想到，韩国总部却打来电话，以以下理由希望我去参加。

会议除了组成国成员以外，还将有来自台湾、香港、越南的学者和专家。就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社会之间的交流和协作，请一定作个发言。

这样，我只好应诺从命了。

九个国家和地区参加

这次国际会议是位于汉城繁华街的“罗蒂大饭店”的大会场举行的，来自韩国各界的三百多人出席了会议。遗憾的是由于紧张的局面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但除了组成国成员以外，确实是有来自台湾、香港、越南、澳大利亚的研究者参加，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会议主题是“北东亚经济圈的展望与太平洋共同体的提案”，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北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协作与发展，就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开幕式上郑世永会长首先代表协会主持者讲了话。接下来中国驻韩国大使张庭延、日本大使后藤利夫、俄罗斯大使 G·F 库那哲先后祝辞。

一共有二十六个人讲了话，中国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孙尚清等五人，俄罗斯有极东研究所所长 M·L 齐达连等五人，韩国有汉城大学教授李天杓等六人，日本有东京外大名誉教授河部利夫等四人。另外还有蒙古、越南驻韩大使，香港亚洲太平洋二十一世纪学会会长黄枝连、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张锦松、来自澳大利亚但在日本上智大学的教授（当时）古列格利·可拉克等。

有些讲演者还就美国总统克林顿在 93 年 7 月提议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规”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围绕着北东亚地区协作将怎样对待北朝鲜这一点上的讨论。特别是韩国的学者和研究者们还提出，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要在政治上以及军事方面给予相应的对付，强硬派和柔和派的意见针锋相对，这使人清楚感到那曾经血战于同一民族之间的“悲剧”还根深蒂固地留在那里。

我以自己多年来采访经验为基础作了题为“亚洲太平洋新时代与北东亚地区协作的展望——借鉴于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对共存的探求”的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借鉴于华人社会之间的交流

现在亚太地区居住着占世界人口 37.8% 的人口，GNP 占 51.7%，贸易额占 40.8%。是什么导致了该地区这种飞速的发展呢？简单地说，此地区经济发展是从美国与日本为先导，紧跟在后面的的是亚洲四条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其后再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尼泊尔、新加坡）。与地球上其它广大的地区相比起来，此地区的自由贸易体制下的雏形发展很明显。另外加上从 70 年代以来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大陆，可以说亚太地区已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

中国在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彻底扭转了以政治思想为主的文革路线，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改革开放路线。第二年又设置了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地区为“经济特区”。近香港的深圳、近澳门的珠海、近台湾的厦门，再加上汕头这四个地区成为了注重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改革开放的最前线。

中国大陆的这种改革开放政策为解决长期以来围绕着英殖民地的香港的前途问题，打开了中英谈判可能的大门。中英谈判从 82 年开始，经过曲折多难后在 84 年达成协议，同意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中英双方还达成“妥协”，香港在归还中国后，五十年内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实行“一国两制”。

第二年即 85 年春天前后，台湾也在政治上出现了变化的兆头。晚年的蒋经国总统的英明决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那也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接着，在 87 年 7 月解除了自国民党建都于台北以来实行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同年 11 月，去中国大陆“探亲访友”也得以实现。

把住了潮流的变化之妙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先后所发生的变化使得“不共戴天之敌”的台湾海峡两岸的严峻的政治对立得

以缓和，促进了“两岸三地”的人们之间以及经济的交流。这是促使以东南亚为中心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社会的交流活跃起来的重要原因。

这种潮流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后也在继续。当时先进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采取了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严厉制裁的决议。但以香港和台湾同胞为首，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访问并和中国进行经济和贸易活动，无视包括日本在内的先进七国，继续着对“共存的探索”。

这种动向也促进了中国与亚洲其它各国的关系改善，90年8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中断了二十三年的外交关系，接着新加坡又在同年10月与中国建交。随着韩国对中的不断接近，双方先是相互设置了贸易代表事务所，继而在92年8月中韩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这种交流和协作的动向也是使得由于天安门事件后曾一度停止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得以复苏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点是无法忽视的。

人为的基准是绝对没有的

这一连的变化过程，我曾在不同的地方作过采访，使我感受至深，我觉得发生在其根底的“思考之变化”可以理解如下。

第一，有道是“穷则通”。为什么贫穷就会变通？中国则说“穷则变、变则通”。意思是“贫穷会导致变化，有了变化才有畅通。”中国大陆的政治思想领先的文革路线就是致穷之物。后来，变为了以改革开放路线为主。这就为中国的前途带来了希望，促进了香港和台湾的变化，使得华人社会之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交流。

另外一点则是“人的判断经常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是庄子的哲理。人类总是喜欢依赖“知性”，把自己的判断看作是绝对的。这是有着思维能力动物的人类宿命的悲剧根源所在。能克服这一弊病的唯一之道就是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知性”之限度，努力超越之。庄子把这个称为“不知之知”。国共内战以及战后冷战局势的影响，台湾海峡两岸一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对立。但这也逐渐朝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方向在变化。

从外面看起来，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对立似乎在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我衷心祝愿有着优秀传统的朝鲜民族不要陷入相互仇视、相互伤害的悲剧之渊。

——以上就是我讲话的要旨。全场的听众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令我惊讶不已而又感动万分。

但愿“穷则通”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即28日，我们参观了位于韩国东南部蔚山的那一片广阔的现代企业工业地带。建筑业、汽车业、造船业、电子业——对韩国建设成的这屈指可数的综合性产业的智慧和力量深感佩服。

当天晚上，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郑世永会长特地为来自日本的与会者举行了宴会。我记者本性难改，又问了会长几个问题。郑会长在回答中就朝鲜半岛的将来是这样说的。

“世界如果对北朝鲜采取严厉制裁措施的话，有可能从北朝鲜内部就会出现分裂，或者也许会出现追

得太急而反咬一口的现象。那样的话，韩国也会遭殃。不管怎么说将会有大批的人从‘北’到‘南’来。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韩国的经济将会倒退十年。”

“还有一点是，要不放松继续与‘北’边的对话，抓住双方人与人和经济的交流机会。在朝鲜战争中，曾有一千万‘北’边的人逃到‘南’边，其中有不少人已经功成业就了。我们一家就是从‘北’边来这儿开创事业的。作为成功者之一，我希望让‘北’边的人也了解这些成果。我希望南北能一起探求共存之路。”

六十五岁的郑会长热情洋溢地演讲着。听着他的话，使我有一种“这儿方有人”的感觉。“穷则通”——这在中国人社会中广泛进行的对“共存的探索”，但愿也能在朝鲜半岛的“南”“北”之间吹出绿芽。同时我也感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是美国和中国以及日本的对应态度极其重要。